

引言



我发现你没有信心——这令我不安。

——《星际大战》黑武士

双方都对

今天在一般被称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阵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双方敌我立场鲜明，一方不但要反对另一方，更要鄙视它，说它很疯狂（用最好听的话说），甚至说它很邪恶（用最难听的话说）。这种对立的情况在针对宗教的议题上显得特别真实而强烈。追求社会进步的自由主义革新派人士喊叫说，保守主义的基要派快速成长，对非信徒既指责又侮蔑。他们指出，因为有超大型教会的推动和正统派信徒的支持，所以政治正在向右倾。而保守主义人士则不断地谴责这个社会，说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受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影响，许多大学、传播媒体和杰出机构都非常地世俗化，然而他们却掌控了文化潮流。

哪一方说的才是对的呢？在今天世界的舞台上，是怀疑主义还是正统信仰的阵营占优势呢？答案是这两个敌对的双方说的都是对的：人们对于传统宗教的怀疑、恐惧和愤怒，有越来越强的



力量 and 影响力；然而在同时，接受健全和正统之传统信仰的人，也一样在增加和成长中。

在美国和欧洲，不上教会的人口一直在增加^(注1)。美国民调问卷中勾选“无宗教信仰”的人口数字飞涨，达到十年前统计数字的两到三倍之多^(注2)。大约从一个世纪以前开始，大部分的美国大学就都正式由以基督教为根基的形态，转变成了明显以世俗主义为主的形态^(注3)。因此之故，在许多具有文化带动力的组织机构中，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就渐渐失去影响力了。然而，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有许多被人以为已经不合潮流的教会——即那些仍然相信圣经无误与神迹的教会——在美国却仍然继续增长，并且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也有爆炸性地成长，甚至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里，有些教会的参加人数也在增加之中^(注4)。除此之外，尽管在绝大多数的大学院校中盛行世俗主义，但在学术界的某些领域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仍有增长：有人估计，在全美国所有的哲学教授和老师中，有百分之十至二十五的人是有正统信仰的基督徒，远超过三十年前少于百分之二之一的情况^(注5)。知名的学者费许（Stanley Fish）可能早已看到这个趋势，因为他曾说到：“当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法国著名哲学家）过世时（2004年11月），有一位记者打电话问我说，在学术界把高深理论和三大巨头——种族、性别和阶级——当作知性力量的中心之后，继承下去的会是什么？我的回答像子弹一样射出：宗教。”^(注6)

简言之，宗教的情况在世界上变为两极化：一方面是宗教化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宗教化减少，这两种趋势正在同时发生。曾经有人坚信，世俗的欧洲国家将会是世界大势的先驱，而宗教的力量和其超自然的形式将会变弱，甚至完全消失。但是这种认为科技进步必将导致世俗化的理论，现在已经被撇弃或大幅修改了^(注7)。因着基督教不太大的成长，以及回教的指数性成长，欧洲所面对的未来已经不再是世俗化了。

两大阵营

在讨论这个对立的現象时，我个人的经历使我拥有一个特别有利的角度。我成长于美国宾州东部的一个主流之路德教会（信义宗）。当我在1960年初期成为青少年时，就参加了教会所开设的两年坚信课程，其中内容包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礼仪与历史等，这个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年轻人对信仰有全面性的认识，以便可以公开地认信与委身。在第一年的课程中，我的老师是一位退休的传道人，他非常地传统和保守，常常讲到地狱的危险以及我们需要强大的信心；可是第二年课程的老师是一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传道人，他热衷于社会行动，而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充满怀疑。这两位老师几乎使我像是在学习两个不同的宗教信仰。在第一年中，我感到我们是站立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必须尽极大的努力和花极大的代价才能逃脱祂的烈怒；然而在第二年中，我们听到的是宇宙中一位慈爱的上帝，祂对我们主要的要

求就是要我们去推动人权并去拯救那些受压迫的人。那时我对这两位老师有一个最主要的疑问，那就是：“你们之间谁没有说实话？”但因为当时我只有十四岁，胆子还小，所以就只能保持沉默。

后来我们全家到了另一间更保守的教会，它是属于一个较小的循道会宗派。虽然那里的牧师和会友都是十分温和善良的人，但在那几年的时间中，我的信仰观中“地狱之火”的层面被加强了许多。再后来我进入了美国东北部的一所大学，是那些优秀的、自由的、小型的大学中的一个，但它很快地就在我想像的地狱之火上泼了冷水。

这所大学里的历史系和哲学系极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之批判理论的影响，风气是走社会激进路线。在1968年的当时，这是领导风潮的前卫思想。社会行动主义极为吸引人，它对于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很引人注目，但是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却让我很困惑。我仿佛感到有两个阵营在我面前，但它们都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些热情献身社会公义的人往往在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而那些严守道德主义的人却似乎无视于世界上随处可见的欺压现象。我个人在情感上倾向于前者的路线，但哪个年轻人不是这样呢——解放受逼迫的人，和你喜欢的人上床！但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如果道德是相对的，那么社会公义不也是一样吗？”这个问题似乎在我的教授们和其跟随者中也争闹不休。然而现在我也看到在传统教会中充满着明显的矛盾；我怎么

能回到支持美国南方和南非国家之种族隔离政策的这种基督教中？基督教对我开始显得非常不真实了，可是我也无法找到另一种人生和思想来安身立命。

当时我并不清楚，但是这种灵性上的“不真实感”，其实是来自我人生道路上的三重障碍。不过在我读大学的期间，这三重障碍逐渐瓦解，使我的信仰逐渐活泼起来，并且对我的生命也产生了影响力。第一重障碍是知性上的。我曾经面对一大堆有关基督教的困难问题，例如：“为什么其他宗教不对？为什么会有邪恶和苦难？为什么慈爱的上帝会审判和惩罚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因此我开始阅读有关这两方论点的书籍和理论，结果我越来越肯定基督教信仰是很有道理的。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您为什么我迄今对此仍坚信不已。

第二重障碍是属于个人内心的。当我们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信仰的建立往往是因为别人的权威，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就需要有个人化与第一手的信仰经验了。虽然多年以来我已经可以开口祷告，也会在观赏高山、大海时受到壮丽美景的启发，可是我从未经验到上帝与我个人的同在。不过这方面不需要什么祷告的知识和技巧，只要有一个让我看到自己之需要、缺点和问题的过程；而正如其他人一样，我的这个过程是被种种的失望和失败所引动的，但这得写另外一本不同的书来详述。我在此要说的是，信仰的历程绝不只是理性的探索而已。

第三重障碍是有关社会方面的。我渴望要找到“第三阵营”，

一群关心世界公义的基督徒,但其基础必须建立在上帝的本质上,而非个人主观的感受上。当我找到那“一伙的兄弟姐妹”(姐妹也同样重要)时,事情对我就开始改变了。这三重障碍没有很快地瓦解或依次消失,反而是相互纠结,彼此依存;我也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来解决它们,只是我到后来才了解到,这三重因素是如何互相作用在一起的。因为我一直在寻找“第三阵营”,所以我就开始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基督徒团体——即一个新的事工——因此我在大学毕业几年后,就进入了这样的服事。

纽约客的看法

在1980年代后期,我和妻子凯西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区开始了一个新的教会,对象是绝大多数不去教会的人群。在刚开始研究、筹备的阶段,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说,这是一个傻子才会去做的事,因为教会通常是保守而不激进的,但是这个都市的风气却是自由和极端的;教会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但是纽约市里大部分的人是单身的年轻人和“非传统式”的家庭;教会最主要代表的是信仰,但曼哈顿区却是怀疑、批判和愤世嫉俗之地;教会最传统的对象——中产阶级——已经因为此地的犯罪率和节节上升的生活费而逃离了,留下的是最顶层和最底层的人,即有钱的大款和贫困的穷光蛋,而这些人只会耻笑教会(别人这样告诉我)。这个城市里大部分的教会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参加的人数在萎缩之中,甚至连维持教堂建筑都有困难。